

# 「後學」批判的批判

• 萬 之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於5月26日就《二十一世紀》今年2月號發表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一文舉行座談會，參加者有中文系主任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教授、蓋瑪雅(Maria Kaikkonen)副教授、正在該系作訪問學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和《學人》主編之一汪暉、正在荷蘭萊登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作訪問學者、順訪瑞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王筱芸、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美學系博士生高建平、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今天》社長兼編輯萬之等六人。

討論者認為，趙文描述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的一些文化現象非常值得重視，是應該深入討論的。趙文對西方「後學」，包括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在移用到中國語境時的文化功能轉換的分析和批判是發人深省的。趙文對這些現象表現的焦慮也讓人同情。不過，這些現

象包含很多不同的命題，反映了很複雜的文化發展，而趙文卻把它們都簡單地歸納成「後學」或新保守主義加以否定，顯然欠妥。

關於趙文批評的回歸本土文化傳統的傾向，羅多弼在發言中說，不能籠統地批判回歸傳統，應該小心地區別同一話題中包含的不同思想傾向。例如杜維明等人強調對儒家文化精髓的繼承，主要探討中國現代性，並使中國的文化認同和政治權力分開。而大陸官方重新重視儒家價值觀念，是想利用文化傳統作為政權合法性的資源，以「民族主義」整合社會，為其政治權力服務。兩者對儒學的利用其實有不同的目的。他認為，如果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對利用傳統文化的「民族主義」進行挑戰，能夠在一種多元的時代潮流中確定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立的立場，那是最理想的。

汪暉在發言中以親身體會說明大陸學人之所以回歸傳統，實有各自不

羅多弼認為，如果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對利用傳統文化的「民族主義」進行挑戰，在多元的時代潮流中確定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立的立場，那是最理想的。

同的理由。包括《學人》創刊者在內的一些年輕學者，是要研究中國人自己的學術史和學術傳統，和社會上一些人談論的回歸傳統不是一回事，和季羨林等老一代學者對民族文化的讚賞態度也有區別。但這種區別恰好被大陸的所謂「後學」者混淆了。所以趙文在批評「後學」的同時，事實上又接受了「後學」捏造的前提，過分簡化了問題。汪暉還指出，雖然這是90年代的討論，但實際上涉及對整個近代中國歷史的看法，其中一個根本問題是對五四以來的反傳統運動的看法。在這一點上，趙文的批評也失諸籠統。比如趙文提到林毓生和鄭敏對五四反傳統的看法，事實上兩人的出發點和結論都非常不同，不可以混為一談。林毓生的一個關鍵論點是傳統文化要創造性轉化。他一面反對五四激進主義，一面強調站在五四立場上創造轉化。鄭敏則是真要放棄五四的立場。

高建平認為，借「後學」來復古當然不可贊成，但深化對過去歸為非主流的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則應該被肯定，不應該說成甚麼新保守主義。

關於趙文描述的一部分知識份子自我唾棄精英地位和責任，認同市場化的通俗文化，甚至出現反精英主義傾向，蓋瑪雅指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得以發展，令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急速下滑，而俗文化消費階層的社會地位則日漸冒升。這說明知識份子控制全社會的文化能力逐漸失效。其實，由於俗文化有它自己的消費者和特別的社會作用，知識份子不應該去控制，或簡單地批判和輕視。羅多弼則認為市場如果不受控制，對文化是一種威脅。一個文明社會的文化生活，至少要有一部分不受所謂自由市場的操縱。國家在圖書出版、戲

劇、電影、電視等方向應該保證一定的文化標準。但是，他反對把市場化和新保守主義聯繫在一起，也懷疑所謂精英主義可以對抗市場化。

汪暉對趙文使用精英一詞表示同情和理解。他認為討論應放在1989年後的中國政治語境中去理解。很多知識份子在這種語境中不但沒有特權，不是控制社會的一部分，反而是被壓抑的一部分。這時，「後學」利用俗文化和傳統等這些範疇來消解知識份子本身，瓦解了知識份子的批判性。所以，趙文堅持的精英主義實際上代表知識份子的批判性。但汪暉認為趙文提倡的精英主義立場無法公正地了解民間文化和俗文化。五四以來，俗文化一直受知識份子的主流文化排斥。1949年以後的社會結構更取消了俗文化的存在空間。從整體來看，這和現

汪暉認為在1989年後的中國政治語境中，很多知識份子是被壓抑的一部分。「後學」利用俗文化和傳統瓦解了知識份子的批判性。所以，趙文堅持的精英主義實際上代表知識份子的批判性，但無法公正地了解民間文化和俗文化。



代性問題有關，因為俗文化一直被看作是傳統、落後和封建性的文化，在意識形態上基本被否定。這種否定現在是應該反思的。

發言者一致認為，所謂雅俗文化的對立是知識份子人為製造出來的。從歷史看，知識份子其實從來沒有絕對地反對俗文化。80年代經濟改革，知識份子絕大部分也是推動者和擁護者。雖然現在有人對文化市場化提出批評，但卻沒有徹底地反對市場經濟，所謂人文精神失落問題也不是由於市場經濟。所以，把知識份子和市場化俗文化對立起來，只是一些知識份子的「話語」批評策略，是一種虛構的關係而不是真正的事實。這些人自己已經形成一種集團，成為一個新的階層的代表。他們有意製造一種「後學」理論來利用俗文化，把它作為一種反精英意識形態來處理，其實是精英裏的反精英。他們運用的語詞，民間老百姓根本不懂。所以，這種「後學」和俗文化本身應該作出區別。

羅多弼認為，在趙文中有一個批評模式：把精英主義和激進主義相聯，把傳統主義及通俗文化和保守主義相聯。這種看法和五四時期胡適等領袖的看法相反。胡適認為俗是激進，而傳統的雅文化是保守。可見激進和保守的定義值得探討。定義的模糊說明趙文運用的對「後學」或新保守主義的批評話語有些混亂。汪暉認為趙文說的新保守主義顯然在暗示和80年代知識份子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意識背道而馳的傾向，也就是說，現在一些知識份子通過回歸傳統和俗文化，不再積極地推動政治改革，變得保守了。同時，由於五四以來主張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主張西化，對傳統往往採取激進的批判態度，所以現在反

對西化、回歸傳統就成為保守。

汪暉贊成趙毅衡的一個最基本論點：在西方語境裏的激進理論，在中國語境變成了保守。羅多弼對此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西方「後學」主要代表自身的態度就很複雜。舉例來說，西方「後學」理論家都反對「進步」這個概念，態度顯得很保守，因為「進步」概念在西方幾乎和激進主義是分不開的。「後學」也是針對西方60、70年代的左翼激進思想而發展起來的。「後學」的權威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哲學上的觀點明顯是非常保守甚至反動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政治方面偏左，而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則為新右派提供了一套思想。另外，「後學」的一個主要方面是非理性主義，是和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背道而馳的，也可以說他們非常保守。

羅多弼和萬之都強調，現代民主社會需要的是獨立的知識份子，而不是精英和精英主義。知識份子沒有特權來控制政治和文化領域，在這些領域有爭議的問題往往不是事實而是價值觀念。正如波普(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所說，這種精英思想包含了極權主義的因素。他們認為中國學者作家常常過分注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而不是「獨立性或不獨立性」，很多優秀知識份子都不願意過問政治，這其實既不合理又不幸。

萬之 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今天》雜誌社長兼編輯。

發言者一致認為，所謂雅俗文化的對立是知識份子人為製造出來的。一些知識份子的「話語」批評策略是製造一種「後學」理論來利用俗文化，作為反精英意識形態，其實是精英裏的反精英。他們的語詞，老百姓根本不懂。